

中國美術全集

建築藝術編
宗教建築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全集

建築藝術編4 宗教建築

中國美術全集

建築藝術編 4 宗教建築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建築藝術編顧問

陳從周 莫宗江 張開濟

單士元 傅熹年 戴念慈

羅哲文

主編 孫大章 喻維國

出版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北京百萬庄)

責任編輯 彭華亮

設計 莊雪敏

圖版攝影 孫大章 喻維國 楊毅生

張少元 周建平

印刷者 百花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八八年十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國內版定價 一八五元

版權所有

建築藝術編顧問

(按姓氏筆劃)

陳從周 同濟大學建築系教授

莫宗江 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

張開濟 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總建築師

單士元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傅熹年 建築歷史研究所高級建築師(研究員)

戴念慈 建設部顧問

羅哲文 文化部文物局高級工程師

本卷主編

孫大章 建築歷史研究所高級建築師(研究員)

喻維國 同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凡 例

一 《中國美術全集》建築藝術編《宗教建築》卷選錄範圍：包括現存的佛教建築、道教建築、伊斯蘭教建築。其中五嶽祠廟、關帝廟等道教建築因為偏重祠祭意義，故收錄在《壇廟建築》卷內。伊斯蘭教的麻扎、拱北及民居建築等按其類型特點分別收錄在《陵墓建築》卷、《民居建築》卷內，本卷沒有收錄。

二 本卷編選標準：凡具有較高歷史價值和建築藝術特色的宗教建築，包括佛寺、佛塔、佛殿、石窟、經幢、道觀、清真寺和禮拜寺等均擇優精選，予以收錄。某些宗教建築在細部裝修裝飾方面表現出高度的藝術成就的，本卷亦擇優予以選錄。

三 本卷圖版編排次序：不分宗教建築類型，而按該項建築的建造年代的早晚，順序編排。以期讀者能對宗教建築藝術的時代特點有所體察。

四 卷首載《中國宗教建築藝術》論文一篇做為本卷導言，由孫大章、喻維國合作編寫。其中概述、佛塔、石窟、道教建築部分由喻維國執筆；佛教建築藝術發展的歷史特色、佛寺布局、佛殿、佛教建築裝修與裝飾、伊斯蘭教建築部分由孫大章執筆。圖版部分共精選了一九二幅宗教建築照片，表現出總體、個體、細部等各方面藝術內容。在最後的圖版說明中對照片均做了簡要介紹，突出該項建築的歷史藝術價值，幫助讀者領會與欣賞圖版的內容。

宗教建築藝術

孫大章
喻維國

一 概 述

宗教建築是人們宗教活動的主要場所。它隨着宗教的產生、發展與傳播而營造起來。由於人們對宗教的虔誠信仰，宗教建築一般保存得比較完整，歷史比較久遠。它遍於全國各地，反映了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不同建築風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建築藝術發展的一個縮影。

中國古代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其中佛教最為昌盛，道教、伊斯蘭教次之，祆教、景教、摩尼教建築遺跡已盪然無存。

中國漢代以前盛行神仙方士之說，但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宗教。佛教相傳由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古印度迦毘羅衛國王子悉達多·喬答摩（即釋伽牟尼）創立。西漢後期經由西域傳入我國內地。從此出現了新的建築類型——佛教寺院、塔和石窟寺。印度、犍陀羅的建築藝術開始為中國建築所吸取，出現了中國建築文化與外來建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東漢末年，豪強混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更是政治動盪，戰爭頻繁，民衆生活日益痛苦。作為宣傳西方極樂世界的佛教，得到廣泛流傳。興建寺、塔、石窟寺成為當時的重要建築活動之一。在北魏統治範圍內有佛寺三萬多所，僧尼二百萬人。而北魏首都洛陽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其中以永寧寺為最大，永寧寺塔尤為有名。國內著名的石窟寺，如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炳靈寺等的開鑿，也始於這個時期（圖版一、六、八、九）。道教產生於中國，奉老子為教主。東漢順帝時（公元一二八年——一四四年）祖天師張道陵始創教。南北朝時期由於宗教利益的矛盾，與佛教相對立。

隋唐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隋文帝楊堅（公元五八一年——六〇四年）曾三次下詔，令各州興建佛塔，隋都大興城（今西安）寺塔林立。京城西南之大莊嚴寺，木塔「崇三百三十尺，周圍一百二

十步」。除都城外，名寺還遍於天下。如浙江天臺的國清寺、杭州的下天竺寺、湖北當陽的玉泉寺等。唐太宗統一全國後，曾下詔於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武則天時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明堂北造天堂，高五層，供大佛像，天堂第三層已能俯視明堂。可見天堂與佛像之高大。隨着佛教淨土宗的流行與世俗化的趨向，佛教經典常用壁畫形式反映出來。寺內的雕塑、壁畫多出於名家之手，與建築融為一體。同時佛教密宗也傳入中國。刻寫陀羅尼經的經幢也隨之而生。唐玄宗時（公元七二一年——七五六年），寺院的數量比唐初幾乎增加一倍，寺院僧侶享有免役，免稅特權。寺院的增加對當時的政治統一和經濟發展帶來威脅。唐武宗（公元八四一年——八四六年）繼位，即下詔滅佛。幾年內拆官寺四千六百餘所，私寺四萬六千六百餘所，僧侶還俗二十六萬餘人，釋放奴婢十五萬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但武宗以後，佛教勢力又有所恢復。現存我國最早的木構建築山西五臺山南禪寺正殿（圖版二二），即為滅佛時所幸存者，著名木構佛殿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正是滅佛後不久興建的。

唐代時西藏地區吐蕃王朝從內地和印度傳入佛教，與當地原始宗教本教經過長期鬥爭與結合，形成了中國佛教的重要一支，即帶有西藏地方特點的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藏傳佛教結合藏族地區的建築特點，創造出具有藏族風格的佛教寺院。

唐代皇室以與道教始祖李耳同姓為由，特別提倡道教。唐高宗並追贈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多處建立宏大華麗的道觀，與佛教對抗。唐玄宗時作太清宮以祀老子。唐代隨着國勢的強大，經濟上對外貿易發達，中國商隊由陸路與波斯、阿拉伯（大食）商人交易，波斯人、阿拉伯人也隨之來到長安。祆教、景教、摩尼教開始傳入中國。但在武宗滅佛時受到株連。伊斯蘭教是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創立的一神教，信奉真主安拉，創於公元六二二年（唐武德五年）。一般認為傳入中國時間為唐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但當時只有來中國的阿拉伯人信奉，社會影響不大。除陸路外，也有從水上來的。今廣州的懷聖寺就是創始於唐代。伊斯蘭教特有的建築結構與形式，如穹窿頂和圓形邦克樓（即圓形尖塔）等也隨之帶到中國。

五代十國是一個短暫的分裂時期，戰亂四起，佛教興盛，修塔建寺之風靡行全國。北宋時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佛教建築有增無減。宋太祖時建開寶寺，寺中木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其土木之宏壯，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國未之有也。」現存河北正定隆興寺是宋代遺留下來比較完整

的一座佛寺（圖版四二）。此外南方的福建華林寺大殿、浙江保國寺大殿都為宋代遺留下來的著名木構（圖版五二）。宋代提倡佛教的同時，也提倡道教。宋真宗時建玉清昭應宮，工程以夜繼日，建造了七年，其間殿宇二千六百二十餘間，每日用工多則三、四萬人，工程規模十分巨大。建於南宋的蘇州玄妙觀三清殿，殿宇宏偉，為現存江南古代木構建築之最（圖版八四）。

北宋時，我國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崇尚佛教。在遼南京（今北京）新建有昊天寺、開泰寺、潭柘寺等。遼朝早期佛寺，保持了很多唐代風格。現存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與山門、山西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與善化寺大雄寶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都是建築史上的重要實例（圖版四九、五五、六二）。

繼遼而起的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金朝佛教也相當隆盛。善化寺普賢閣和佛光寺文殊殿堪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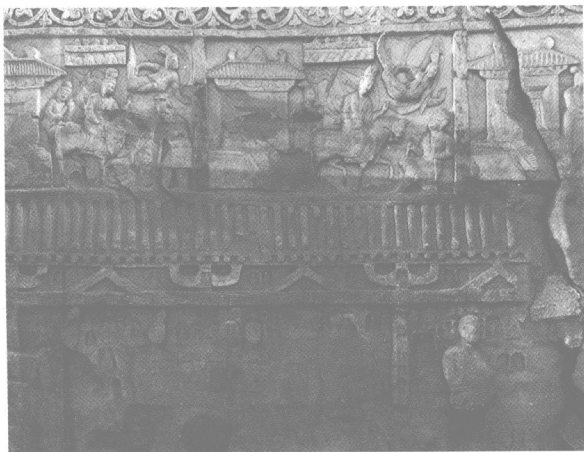
宋代我國沿海地區的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城市都有不少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水手經常來往。有的就在當地定居。於是在這些城市中出現了一批伊斯蘭教寺院。除廣州的懷聖寺外，還有泉州的清淨寺（圖版九五）、揚州的禮拜寺（仙鶴寺）等。十世紀前後，伊斯蘭教傳入我國新疆地區，在當地各族人民中影響不斷擴大，逐步取代了佛教的地位。

唐宋時期，我國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如西南的南詔、大理，西北的西夏，東北的渤海國，也都信奉佛教，至今還保留了崇佛遺跡。

元代版圖遼闊，十三世紀四十年代，西藏地區歸附蒙古政權。元代奉藏傳佛教為國教，封西藏宗教首領為法王。在西南、西北和蒙古地區興建了許多藏傳佛教寺院和塔。同時對各宗教採取並存發展的方針，除了仍建造許多漢族傳統的佛寺外，道教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現存山西芮城永樂宮就是一組完整的道教建築。蒙古政權曾三次出兵西征，統治了中亞和西南亞廣大地區。這些地區的許多伊斯蘭教徒相繼來中國。他們多數居住在西北各省。經過長期的融合，形成回族。伊斯蘭教也隨着得到傳播。這時的伊斯蘭教建築開始和中國木構建築相結合，形成獨特的風格。

明代時道教受到朝廷的大力扶植。洪武二十四年（公元一三九一年）下詔對龍虎山上清宮進行大規模擴建。明成祖時，曾派三十萬軍民到湖北大修武當山道觀，歷時七年，建成龐大的道觀建築羣。清代對道教雖未加提倡，但民間影響仍著。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和四川青城山成為全國著名的道教聖地（圖版一一〇、一八六、一八七）。明清時期伊斯蘭教為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

圖一 山西大同雲崗石窟第六窟窟壁廊屋雕刻



族所信奉。伊斯蘭教建築幾乎遍及全國。如喀什的艾提卡爾禮拜寺、吐魯番的蘇公塔（圖版一七〇）、北京牛街清真寺、西安化覺巷清真寺、成都清真寺等都是著名的清真寺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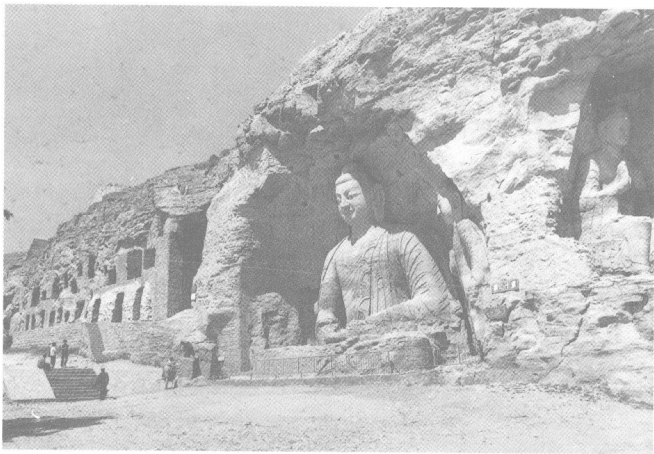
明清的大型佛寺有南京靈谷寺，報恩寺和山西太原的崇善寺等。現存比較完整的有北京智化寺、碧雲寺、山西太原的永祚寺等。雲南西雙版納和德宏地區的佛寺與佛塔，在傣族人民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清代爲了聯係和團結蒙古族、藏族等少數民族上層人物，極力提倡藏傳佛教。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重建和擴建了西藏布達拉宮（圖版一四三）。僅在內蒙各旗，就有藏傳佛教寺院一千餘所。西藏、四川、甘肅、青海等地的藏傳佛教寺院的數量則更多。從十八世紀初，在河北承德建造離宮——避暑山莊，圍繞離宮的東面和北面的山地上，建造了十二組藏傳佛教寺院。這些建築有藏式、漢藏混合式和漢式三種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東南到浙江等許多地區著名建築的特點，集中了當時建築上的成功的經驗而創造出來的，反映了當時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圖版一六四）。

二 佛教建築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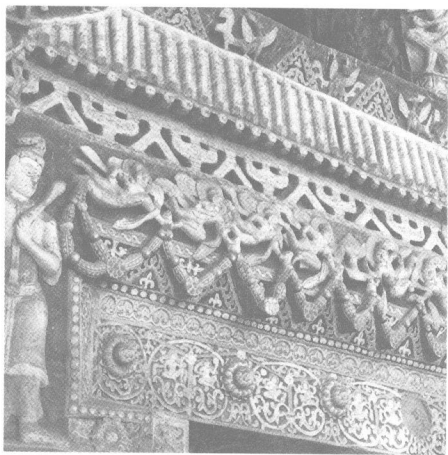
（一） 藝術發展的歷史特色

自東漢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年）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由於當時佛教教義尚不完備，中國的宗教觀念也未形成，因此人們只把「佛」作爲自然界的一個神靈進行祭祀。據《後漢書》記載，東漢光武帝的兒子楚王劉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又提到漢桓帝劉志在濯龍官亦曾「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文中所述的「浮屠」、「浮圖」即佛的梵文音譯，說明當時對佛的認識與固有的天、地、山、河之神同樣看待。當時雖已傳入佛教的經書和畫像，但國外的佛教的建築形式並沒有傳入，加之平民不能出家爲僧，寺院數量不多，所以當時尚未形成獨立的佛教建築類型，佛教建築藝術僅處於萌芽階段。最早建立的洛陽白馬寺這座廟宇即是仿造官府建築形式建造的。估計當時人們對佛的虔誠崇拜之情集中在像設及莊嚴等方面，而在建築藝術方面的要求並不突出。

自三世紀至六世紀，約當於中國的西晉及南北朝時期，佛教進入興盛時期。這時期自印度及大月



圖二 山西大同雲崗石窟第二〇窟大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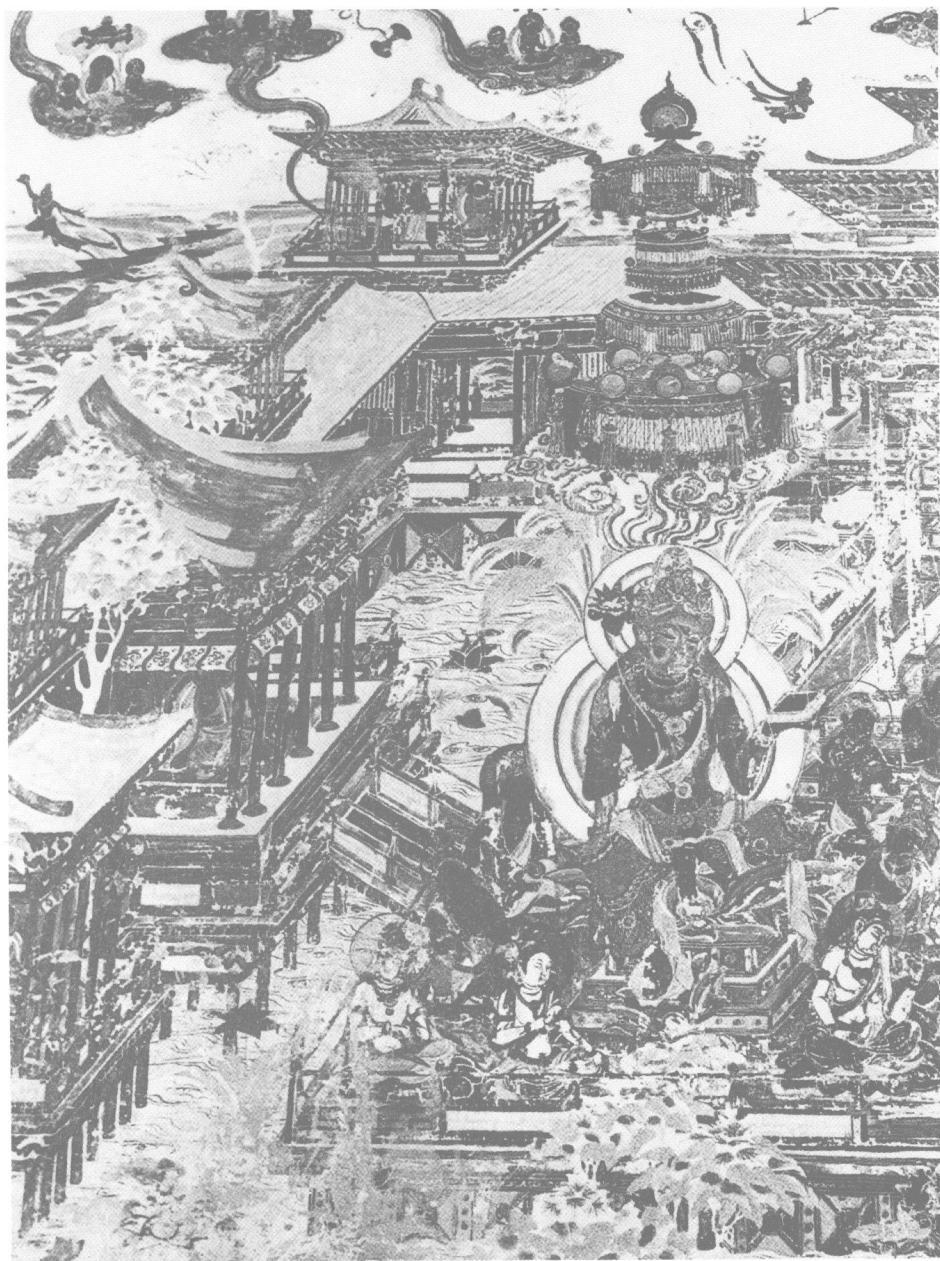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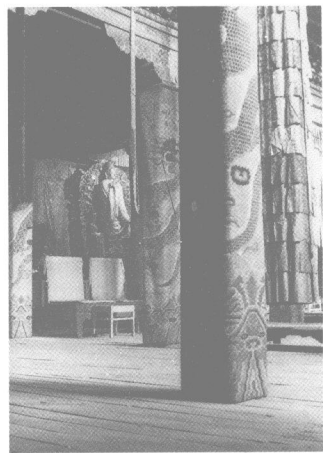


圖三 山西大同雲崗石窟第一〇窟雕刻

氏國來中國的傳教僧人甚多，如竺法護、佛圖澄等都是著名僧人。隨着域外僧人來華，必將印度等諸國的藝術風格帶入中國；而且漢族平民大量出家，也推動了寺廟建造活動。這時期中國佛教建築（佛寺與佛塔）是以印度及犍陀羅藝術為範本。在《魏書·釋老志》中曾提到「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說明這時期盛行以塔為中心，周圍環繞着僧房的佛寺布局方式即是印度佛寺常用的方式（圖一、圖版二）。開鑿石窟寺也是一種模倣活動，遺存至今的著名的甘肅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圖版九）、永靖炳靈寺石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圖二），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圖版六）等都是這時期開鑿的。依據新疆現存的佛教石窟可證明鑿窟之風正是從大月氏越葱嶺經西域諸國傳入內地的，流脈甚清。敦煌、雲崗早期洞窟的佛像雕刻造型多具有隆鼻、細目、長耳、豐頤、袈裟貼身的特徵，明顯帶有犍陀羅藝術風格。此時不僅多層樓閣式塔普遍應用，而且倣倣印度教天祠建築的密檐式塔也已出現（圖版一一）。此外，印度佛教裝飾題材，如蓮花、飛天、苾芻葉、花圈、獅、象等圖案也大量應用在中國佛教建築上（圖三）。總之，這時期可稱倣倣在傳統的工程技藝基礎上，大量吸收與模倣外來藝術的時期。

自公元六世紀至十三世紀，約當於中國的隋、唐至宋、遼、金時期，佛教在中國經過六〇〇餘年的傳佈，同時又與傳統的儒家思想融合，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式的宗教。出現許多具有高深佛學修養的中國僧人，並創立許多佛教宗派。這時的佛教建築也完全形成了中國式的宗教建築。例如寺廟布局逐漸向宮室建築形制轉化，以塔為中心轉變成為以佛殿為主體的縱向軸線式布局，廊院式變為四合院式；根據中國建築以木結構體係為主的特點，在泥牆上繪制壁畫的風氣極為流行，出現許多技藝精湛的宗教藝術畫家，特別是受淨土宗的教義影響，描繪西方淨土世界的華美的淨土變巨型壁畫成為這時期佛教壁畫的重要題材（圖四）；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出現許多大型佛像，帶動了多層樓閣建築的建造活動，形成別具一格的中國式高層建築；南方禪宗寺院中為講習義理增設了法堂或講堂建築；而密宗為誦禱陀羅尼經以祈福，在寺院中設置了固定的石質經幢（圖版一九、三二）。這些都是中國佛教建築由於內容的新發展而帶動了建築藝術的發展。這時期的佛塔已由木結構向磚石結構轉變，平面形式和外觀都更豐富多采，幾種主要佛塔類型都已出現。在室內裝飾上除了活動性的華蓋、佛幡以外，逐漸出現固定式的藻井、佛龕、佛帳，以及表現天國世界的模型式的天宮樓閣。總之，這個時期宗教藝術與民族傳統藝術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完全中國式的佛教建築藝術。

圖五 內蒙呼和浩特席力圖召大經堂內景



圖四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一七二窟唐代壁畫

自十三世紀至十九世紀，相當中國的元、明、清時期，佛教從漢族地區推向更廣大的兄弟民族地區，擴大了信徒範圍。因此教義更加簡易，專以誦咒祈禱為主要儀式的藏傳佛教成為佛教的主要流派，以便向文化低的平民進行佈教。藏傳佛教特有的佛塔式樣，即類似瓶子式樣的喇嘛塔在全國各地建造起來（圖版九一）。藏傳佛教寺院內僧徒眾多，經常聚在一起誦經，需要建立室內空間巨大的經堂建築。這種建築的屋頂往往是由幾個屋頂組合在一起的，由頂部采光，室內昏暗神秘，在傳統建築中很少見到這種形式（圖五）。西藏地區的藏傳佛教寺院多建在山區，依山就勢，不規則地布置了佛殿、

經堂、僧房院等許多建築，規模龐大，氣勢恢弘，較過去時代的佛寺具有更大的藝術感染力。分佈在全國的很多藏傳佛教寺廟在建築藝術形式上更多地吸收了藏族建築風格，高臺座、紅白色的外牆粉刷、金瓦頂、梯形藏窗等，裝飾效果非常富於刺激性。另外還出現了一種新塔型，即在高臺上建立五座小塔的金剛寶座塔，其形制是像徵佛所居住的須彌山（圖版一二二）。藏傳佛教的佛像與壁畫往往表現出形狀怪異的鬼神形像，與前期的漢式佛像完全異趣。總之，此時期佛教建築較以前更具有超凡脫俗的趨向，與反映人世間情趣的建築藝術面貌拉開了較大距離，神秘氣氛加深。縱觀近兩千年的中國佛教建築的發展，若與其他世俗建築相比較，從它的佛寺布局、佛殿、佛塔、石窟、裝修與裝飾諸方面都顯露出自己的藝術特點，綜合構成了中國式佛教建築的特有風貌。

（二） 佛寺布局

歷史上曾出現過多種布局形式，最早出現的是廊院式。這是一種受印度佛教寺院形式影響，並結合中國傳統構圖習慣而形成的形制，即在每一個佛殿或佛塔的四周以廊屋圍繞，形成獨立院落，大的寺院可以由許多廊院組成。據《後漢書·陶謙傳》記載，獻帝時丹陽人笮融在徐州「大起浮屠祠，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迴，可容三千許人」，這座寺廟即是廊院式布局。早期廊院是以佛塔為中心的，但至南北朝時期由於「捨宅為寺」風氣的影響，廊院內出現了以佛殿為中心的布局，或者殿、塔並置的形制。據《洛陽伽蘭記》記載，北魏洛陽城中最大的寺院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規模十分壯麗。這種布局即是前塔後殿的廊院形制。隋唐時期寺院規模更為宏大，建築類型增多，很多寺廟皆是由數個院落組成，每個院落皆可根據其內容加以標名，如觀音院、彌陀院、淨土院、塔院、翻經院等。唐代長安慈恩寺在盛時曾有十幾個院落。廊院式寺廟中寬廣的廊壁也為佛教壁畫藝術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場所，豐富了寺廟建築的藝術表現力。從建築藝術角度分析，廊院式寺院構圖特點是向心的，突出中間的佛殿或佛塔，對於獨院來講可以形成強烈的藝術面貌。但對於多院的組羣式布局則顯得主題過於分散，不易形成統一構思，而且也不適於修建在較複雜的地形上，所以後來被縱軸式的布局所代替。這種形式的典型寺廟在中國已無存留，僅在個

別寺廟布局上尚存有痕跡，例如明代太原崇善寺的布局（圖六），但日本奈良的法隆寺布局却保留了典型的廊院式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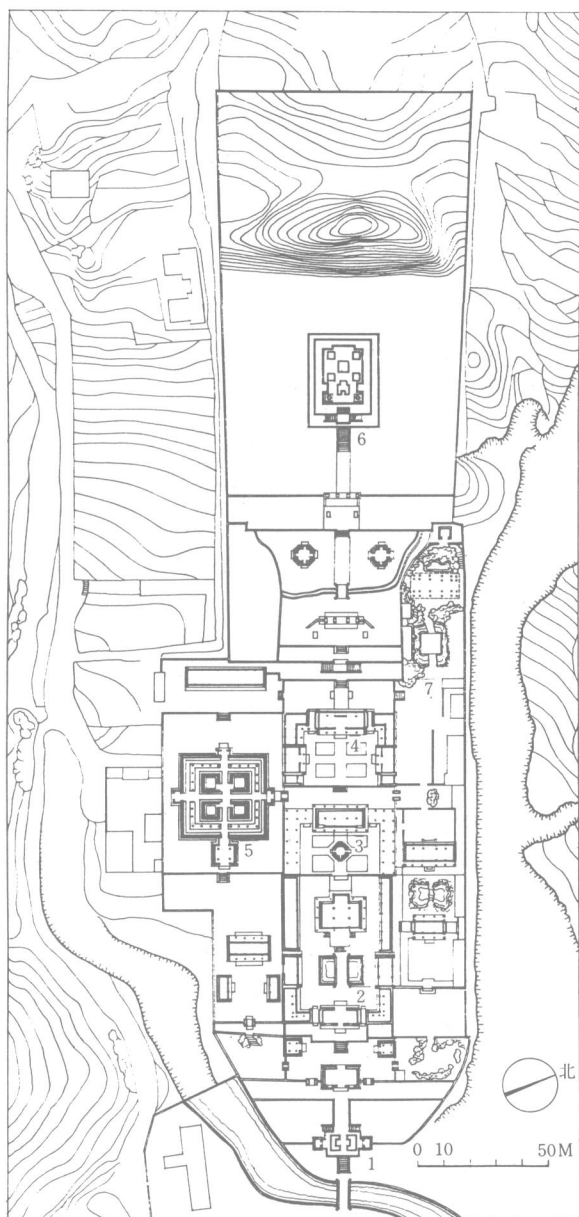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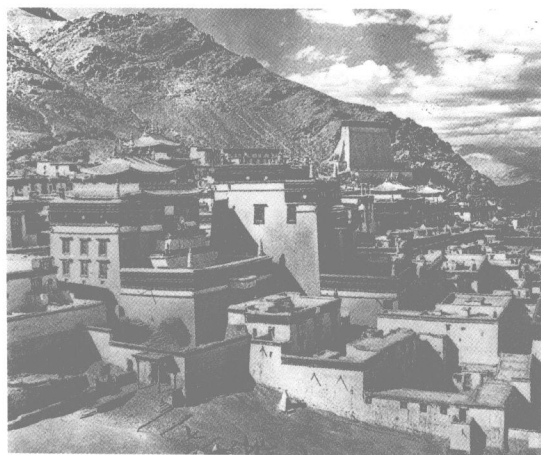
繼之而起的是縱軸式布局。這種佈局將各主要殿堂布置在一條縱軸線上，每個殿堂前左右各置一座配殿，形成三合或四合院落。這種排列有序的院落羣可引導信徒有秩序地、有層次地觀賞全部寺院，以達到信仰的高潮。軸線上各進院落可以借助主體建築造型不同、院落空間大小不同以及附屬建築的不同以取得建築藝術上的變化。較大的寺院還可以並列有兩條或三條縱軸，在側軸部位可以建造塔院或花園、禪房等。每進院落根據地形高低建立在不同的標高上，雖然平面布置是規整的，但實際建築空間却是豐富多變的，每個寺院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這種類型成為中國佛寺中應用地域最廣、時間最長的寺院類型。早在敦煌唐代壁畫中即可看到當時寺院在正中布置大殿，兩旁為高臺樓閣，用飛閣複道相聯係，殿前配置有東西配殿，形成具有明顯中軸線，有層次變化的庭院空間。現存河北正定隆興寺總平面仍然保持宋代布局，是縱軸式布局的優秀實例。自山門前的照壁開始，沿中軸縱長三百餘米分別建造了山門、大覺六師殿、摩尼殿、佛香閣、彌陀殿等多種建築物，造型各異。主體建築佛香閣是一座多層樓閣式建築，閣內供養着二四米高的銅鑄千手觀音像，閣前左右配置慈氏閣及轉輪藏殿，形成建築組羣的高潮，全寺殿宇重疊，院落互異，具有豐富的藝術觀賞性（圖七）。北京碧雲寺是沿山區地形布置的縱軸式寺廟的佳作。層層佛殿及牌樓沿臺地梯級而上，步移景異，最後以金剛寶座塔做為統領全局的全寺結尾，氣勢十分雄大。左右兩側並布置了水泉院花園和田字形平面的羅漢堂，更增進了寺廟建築藝術的多樣性（圖八）。

在中國佛教發展的後期出現了一種自由式的布局，是隨着藏傳佛教的盛行而在西藏地區創立的。它的布局特點就是沒有明顯的主軸線，按照地形較自由地布置寺院各類建築，不均衡中求對稱，變化中見協調。這種形式的形成一則是受西藏宗山建築的啓發（宗山即西藏地區地方行政管理機構，它一般設在山上，利於防守）；再則是因為藏傳佛教寺院的宗教內容及建築類型較多有關。在一般寺院中除了布置供養佛像的佛殿和講習佛法的經堂建築以外，尚有保存活佛遺體的靈塔殿，信徒轉經的轉經廊，具有紀念意義的喇嘛塔和活佛公署、喇嘛住宅等。並且這些建築隨着時間的推移，也在不斷地調整、擴建與新建，唯有自由式佈局才能適應這種變化着的要求。自由式布局各類建築形體完全依附於地形的起伏變化，能創造出各種奇特、雄偉的造型，為中國傳統建築增添許多新穎的意趣。具體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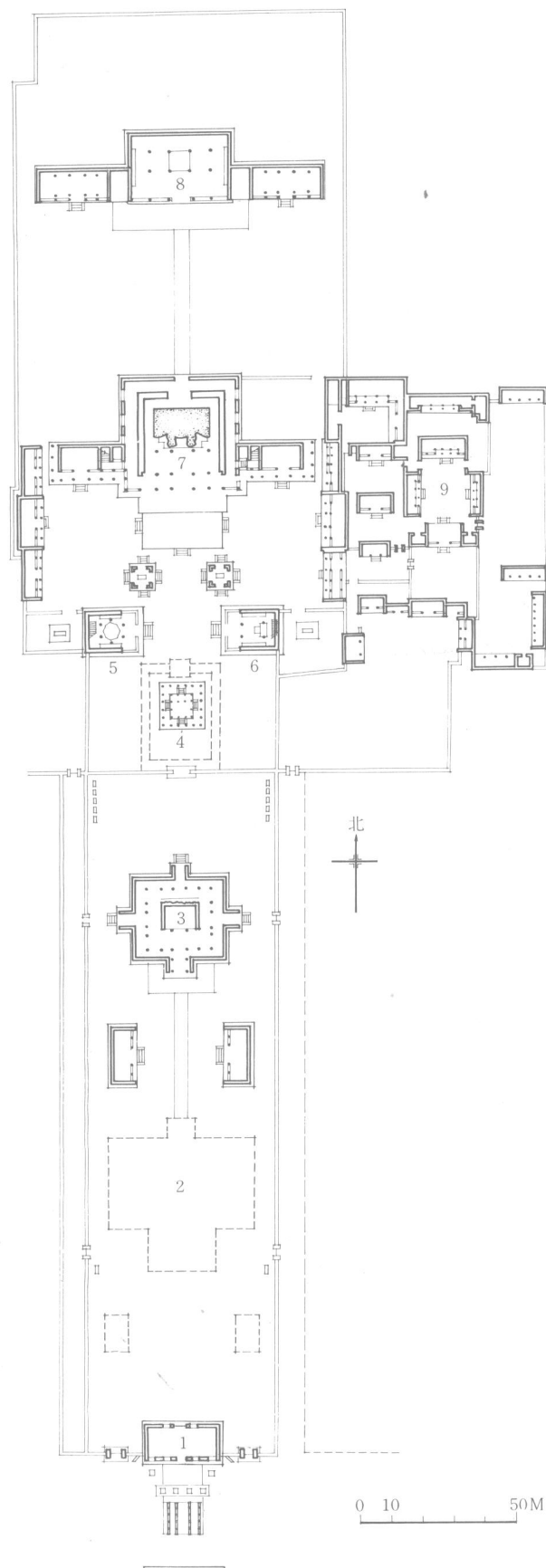
圖六 山西太原崇善寺 (一)外景(上圖) (二)復原圖(下圖)

圖九 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圖八 北京碧雲寺總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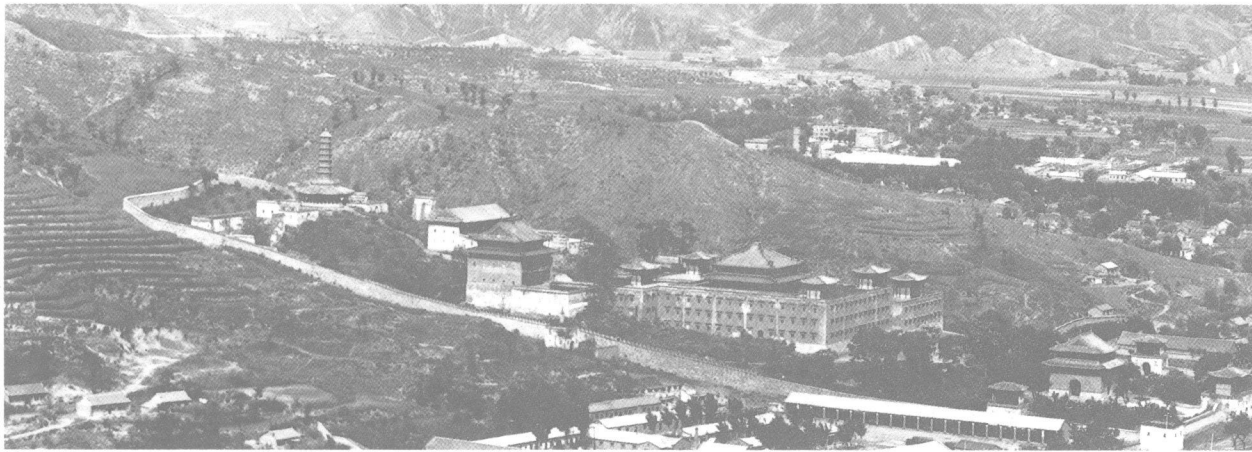
- 1—山門；2—彌勒佛殿；3—菩薩殿；4—孫中山紀念堂；
5—羅漢堂；6—金剛寶座塔；7—水泉院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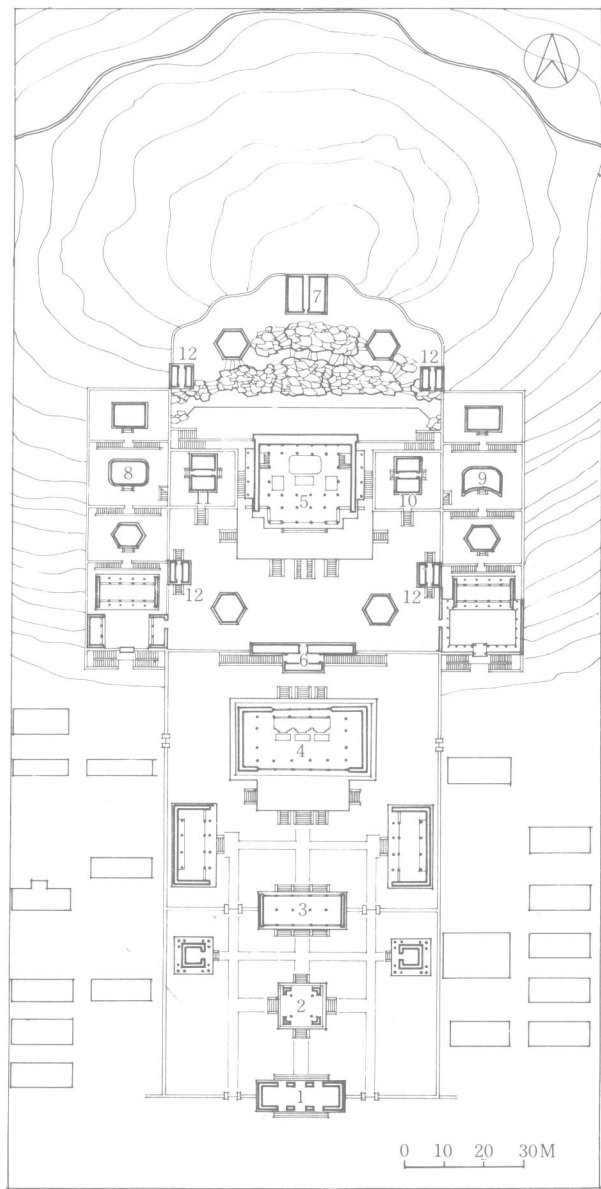
圖七 河北正定隆興寺總平面圖

- 1—山門；2—大覺六師殿址；3—摩尼殿；4—戒壇；5—轉輪藏殿；
6—慈氏閣；7—佛香閣；8—彌陀殿；9—方丈

圖一〇 河北承德須彌福壽廟



形式與布局在全國各地區又有差別。西藏、四川西部地區多用塊石壘砌的藏式平頂樓房，兼有少量漢式坡屋頂或金瓦頂。寺院建在山上或山下，布局都很自由靈活，例如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圖九）。甘肅南部、青海地區的寺院中漢族建築形式的影響加深，一般其大殿的主要立面多為木結構梁柱式樣，而其他方面仍保留藏式建築裝飾，以及藏式建築的特有的厚牆，在局部重點地段體現出一定的軸線布局意圖。如青海湟中的塔爾寺。而華北、內蒙古地區的許多寺院大量應用漢族傳統建築形式，僅有少量藏式裝飾，應用對稱軸線布局的地段明顯加多。如承德須彌福壽廟（圖一〇）、呼和浩特的席力圖召等。這個時期尚出現一種奇特布局，即模倣佛教的世界觀念用在總體布局上。按此概念世界中心為須彌山，其兩翼有日、月，須彌山四周被大海包圍，海中有四塊大陸地，八塊小陸地，稱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按東西南北方向分布在須彌山的四周，每塊陸地都有特定的形狀。寺廟建築布局也按此概念布置了大大小小各類建築或壇臺，分別代表須彌山、日月、部洲等內容，用以體現佛的世界形貌。建築造型藝術反映在布局上以此類型最為突出。西藏桑鸞寺和承德普寧寺都是例證（圖一一）。此外，還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布局實例。如建立在絕壁半腰的山西渾源懸空寺（圖版一八八）；周圍包有城牆的西藏夏魯寺；諸寺鑿集於一處的山西五臺山寺院；隱於林石之間，創造出幽雅恬靜環境



圖一一 河北承德普寧寺總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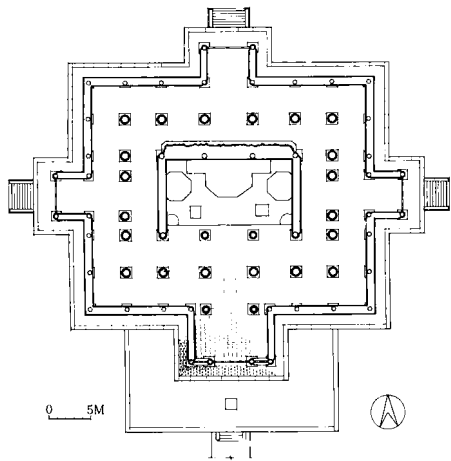
- 1—山門；2—碑亭；3—天王殿；4—大雄寶殿；5—大乘閣；
6—南瞻部洲殿；7—北俱盧洲殿；8—西牛賀洲殿；
9—東勝神洲殿；10—日殿；11—月殿；12—喇嘛塔

的浙江普陀山寺院；以及具有民居色彩，小巧樸素的安徽九華山諸庵堂。中國寺廟布局具有多樣化的特點。從藝術上看最突出的成就為院落空間構成的方式和巧妙地利用地形的技巧。

(三) 佛殿

早期佛教的佛像是設在佛塔內，以後才出現中國式的佛像供養殿，根據使用要求在歷史上曾出現過多種類型的佛殿。最常用的為宮室式佛殿。這類佛殿為單層橫長方形，面闊為三、五、七或九間。與帝王宮殿或府第大宅的主體建築沒有區別。因為自公元五世紀以來「捨宅為寺」成為社會流行風氣，佛教信徒經常將自己的住宅贈給寺院，以建立功德。這種在住宅基礎上改造的佛寺，不但沿用舊有的布局，而且主殿也是利用原有廳堂建築。由於中國佛像是多佛並列供養，或主要佛像與弟子，菩薩同在一殿，因此這種橫長方形殿堂很適用，長期成為佛殿的通用形式。這類佛殿的建築藝術表現力並不突出，其宗教特點主要從室內的壁畫、塑像及裝修裝飾方面體現出來。中國現存的早期宮室、住宅極為稀少，宮室式佛殿却可反映出當時結構、裝修、構造等方面的發展情況，成為建築史中有價值的證物。此類型中突出的實例為建於公元八五七年的唐代五臺山佛光寺大殿（圖版二四）。宮室式佛殿亦曾受世俗建築影響，產生出一些新的形式：例如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在近乎方形的重檐歇山大殿的四面各加築了一個抱廈，形成了較複雜的屋頂組合（圖一二）；有的佛殿在前面加築了空透的拜殿；有的佛殿與後殿之間用走廊聯接起來，形成工字殿，例如明代太原崇善寺大殿；某些寺廟受傳統宮殿的東西堂制度的影響，在大殿兩側平行加設東西廂殿，形成三殿並峙的布局，加強了主體建築的藝術感染力，如北京雍和宮的萬福閣及其左右的永康閣、延綏閣即是三殿並列的形式（圖版一五九）。為了突出供養佛像的藝術效果，在宮室式佛殿內部設計上有許多變化，在佛像背部加設一字形或口字形的扇面牆，以明確佛殿的方向性。牆背後設觀音像做為後入口的對景。後期佛殿在結構上採用大內額的構架方式，以減少內柱數目，擴大佛像前的空間，便於佛事活動及信徒瞻仰雕像。

另一種為樓閣式佛殿。由於冶鑄、泥塑以及制漆技術的發展，佛殿內可以不依靠石材，採用金屬、泥、漆為材料制作佛像，而且體形高大。公元八世紀以後，佛教密宗十分推崇觀音菩薩，寺院中往往單獨建造觀音閣，內部供奉觀音立像。這種高大的站像要求建造高大而中空的建築物，直接推動了多



圖一二 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平面圖